

日本学者

中国文学 研究译丛

【第一辑】



吉林教育出版社

日本学者
中国文学研究译丛

【第一辑】

吉林教育出版社

日本学者
中国文学研究译丛

第一辑

刘柏青 张连第 王洪珠 编

*

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875印张 210,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册

统一书号：10375·1 定价：1.90元

祝《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出版

公 木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已有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有一千多年的文字之交。人所共知，在我们上千年的文字之交当中，特别是七、八世纪以后，日本曾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最显著的是唐代的文化和佛教的文化，学习得很出色，很有成效。而到近百年间，就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过渡前后，中国许多有志之士和进步人士曾络绎东渡，学习辗转传播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以至社会主义思想。假如说，一千年当中，日本向中国学习有很大收获，那主要是由“大化革新”到“明治维新”以前，促使日本由奴隶制社会进入到封建制社会，发展了封建主义的文化，并准备了迎接现代民主曙光的条件；那么，近百年以来，中国向日本学习，就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它对播种新思潮的火花，促使着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走向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更走向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我称述“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祝颂中日文字之交，不是虚语，决非偶然。不幸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发生了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以至日本人民造成了很大伤害。但是发自中日人民深心的虹光已经搭起了一座长桥：

这长桥已经搭起了两千年，

原材料都是文化诗歌友谊。

尽管几度时代的狂风暴雨
把它吹断；却又自动地相连。

文化是历史波涛交汇的汪洋，
诗歌是人类精神天空的雷电，
友谊是发动云蒸霞蔚的阳光——
这是不能摧毁的人性大自然。

当此高唱中日团结，友谊长青，巩固东亚和世界和平之际，刘柏青等同志自愿组合，以增进中日友好，开展文化交流为宗旨，锐意编辑《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翻译日本当代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成果，结集出版，为国内学人提供借鉴，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裨益文苑，无可限量啊！

如前所述，域外研究中国文学，日本居于领先地位。这不仅在古代，如诗、骚、赋、词、曲，陶、李、杜、白、陆，都已“荫江户，光海东”，潜入民族意识，累积下汗牛充栋的学术专著；而且到近代、现代，对中国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以及许许多多新老作家，也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各有专家以至集体从事研究。笔者曾于五年前随同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耳听目视，实深深烙下这种感受。所以介绍日本学者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成就，定然会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它对于加深人民之间的理解，建立中日长期友好关系，将会有所贡献，自然不必待言。

鉴于在中国文学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迹象，随着文学领域的开拓，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经验的聚集，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也相应具有着向上运动的趋势。当此之时，我们亟需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方法，在现实和历史材料中阐发出新的思想来。那么，“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多了解了解自己在别人

心目中的形象和评价。这也如同照照镜子，也就是借鉴。这种借鉴是永远必要的。我们应该认真地借鉴，虚心地借鉴，比较评章，推陈出新。一则万万不可有“洋鬼子看戏——傻眼”一类民族自大的颀预态度，二则也绝对不要“一经洋文评价，便如鱼跃龙门”那么忘乎所以的盲目心理。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交流，而这种交流自当实实在在地有助于中日人民友谊的巩固，有利于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树。

让我们预祝《译丛》茁壮成长，在中日学术界发挥它相应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吧！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于长春

告 读 者

- 一、本《译丛》暂为不定期出版，面向全国，并向国外发行。欢迎国内外作者、翻译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投稿、订购。也欢迎日本学者直接惠寄稿件，日文、汉文均可。如寄原文，本《译丛》编委会可组织人力翻译。
- 二、本《译丛》的宗旨及刊登译文的范围，已在第一辑编后记中作了详细说明。
- 三、来稿请用通用稿纸按通行格式缮写清楚，并请附寄原文。
- 四、来稿请寄：长春市斯大林大街 102 号吉林教育出版社《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编辑组。本《译丛》由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也可向本社函购。

目 次

楚辞与屈原

——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

冈村 繁 作 孙东临 译 (1)

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和文论

——中心谈“骨”……………

釜谷武志 作 卢永临 译 (27)

杜甫的诗论和诗

——在京都大学文学部最后的一次讲演……………

吉川幸次郎 作 张连第 译 (44)

词论……………仓石武四郎 作 何乃英 译 (73)

意象与表现……………横田辉俊 作 石 山 译 (82)

《金瓶梅》的日译、欧译……………

小野 忍 作 张宇红 译 (95)

关于渔洋山人的《秋柳》诗……………

吉川幸次郎 作 贺圣随 译 (102)

鲁迅的“第三种人”观

——关于“第三种人”论争的再评价问题……………

丸山 升 作 林天远 译 (115)

鲁迅和西方近代的相遇……………

伊藤虎丸 作 李冬木 译 (144)

巴金试论

- 《家》的结构……………山口 守 作 邵毅平 译 (169)
- 赵树理研究与小野忍……………釜屋 修 作 潘世圣 译 (184)
- 从一九三七年“反差不多论争”

中看沈从文与南北文坛的地位……………

尾崎文昭 作 靳丛林 译 (197)

《蝴蝶》日译本跋……………相浦 果 作 张小钢 译 (230)

访问作家张洁女士……………

与小田隆一 作 刘光宇 译 (237)

关于“读书”

——结构与读者……………室井 尚 作 林 岗 译 (248)

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目录索引(一)……………

刘庆澄 辑译 (263)

编后记…………… (275)

楚辞与屈原

——关于主人公与作者的区别

冈村 繁

一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文学的主要作品，大都被看作是楚国爱国的悲剧诗人屈原吟咏自己的忠诚和幽愤的格调很高的不朽名作，而且，认为屈原是爱国诗人的这种评价，特别是在新中国，近来越来越受到强调，看来现在正酝酿成一种定论。然而，屈原果真是楚辞的伟大作家吗？毋庸置疑，这种屈原观是来自遥远往古传统观点的极富权威的见解。不过尽管如此，这种观点我还是觉得难以苟同。因为，把这么多的楚辞作品一律看成是屈原一个人的作品，用同样的调子喋喋不休地发泄牢骚，总给人一种过分之感；并且，屈原这样地吟咏自己的行动和心情，读之令人觉得也未免太有些自吹自擂；再有在古代，如果这些作品偏偏都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那么他的作品的诗型也显得过于多样化了。

不仅如此，根据近年来在原属楚国版图的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曾为楚国最后一个都城的安徽寿县等地发掘出来的大量考古成果，战国时代的楚国尽管是所谓荆蛮之地，然而似乎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奢华富丽、水平很高的文化。并且，其发达而又多采的文化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即楚国辈出的修辞学家所惨淡经营的言辞和文章，至今我们也可以从《楚策》及《史记·

楚世家》中发现一些^①。如果从楚国这种绚烂的文化环境加以推察，可以认为至少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一般都掌握了相当洗炼的美感乃至文学技巧。因此，具备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的才能的诗人，在他们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存在着好几位。如果我的这种推测并非怎么悖谬的话，那么历来把屈原一个人，并且又是大多数楚辞作品同一主人公的他，就那样地判定为楚辞作品的同一作者，不能不令人觉得对古代事物的理解过于简单、肤浅而又武断了。

在大约作于战国末至汉初的时代较早的楚辞作品中，内容正面提及屈原的、或者强烈意识到他的存在从而歌咏之的诗章，可以断定的有《离骚》、《九章》、《九辩》、《招魂》、《远游》、《渔父》、《惜誓》以及贾谊的《吊屈原赋》、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诸作，长短加在一起，它们的总数已多达四十篇。由于与屈原同时或与其时代较近的作品留下了如此之多，如果屈原真如后世所宣传的那样是伟大的楚辞文学的创始者，真有很多名作传世的话，即使不说是其全部的作品，至少说其创作了那篇最高杰作《离骚》这一点，似乎多少言及一下才对。然而，不管是哪一篇都仿佛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只是一味地吟咏仅作为忠臣的屈原悲痛的一生及其天地游行，对于他作为楚辞作家之事哪怕提及一句的作品，竟意外地完全没有。把屈原的事迹及其精神传颂到今天的诗章，即如上所述的作品群——至少其中大部分属于最古的资料，而它们全无例外地不提屈原是楚辞作者的这种普遍现象，看来似乎表明汉初以前人们所持有的屈原像，仅止于是一位忠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及爱国诗人的两汉以来的屈原观，很明显大大地超越了汉初以前的屈原观。这两种新

旧有别、广狭且异的屈原观，在其推移演变过程中，具有除非假定有某些人为的扩大或包摄作用就不能无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性质上的悬隔。可是，如否认有人为的机因介入其间，那么，这两种屈原像的消长——仅仅作为忠臣的屈原像不知不觉地自消自灭以后，具备忠臣、诗人两种性格的、可以说是更加伟大的屈原像独自传留到后世的現象，究竟如何理解才算妥当呢？

把屈原断为楚辞的伟大作家，从而所产生的如上述及的一些不合情理之处，恐怕不仅是我，凡是读过楚辞的人不管是谁都会或多或少地察觉到。然而，对于这些不合情理之处置之不问，仍把屈原看成楚辞文学的创始者，并把它当作不可动摇的前提来阅读考察楚辞，也是有其不无道理的根据。这就是因为——如前稍微论及的那样——实际上存在着被我们难以摇动的权威所支撑着的古来传统观点，也就是汉代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6）的《史记·屈原传》中的言论：

（1）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2）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3）……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

（4）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②。

还有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所说的：

（5）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脩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

愤》。（《史记·太史公自序》同）

司马迁的这些话，特别是他的《屈原传》，众所周知，在其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具有绝对权威，并规定和限制着后世的屈原观。而且，因袭司马迁的见解的，有首编《楚辞》十六卷的前汉末刘向（前77—前6）的《新序·节士篇》中的屈原传记^③，及其《九叹》中所说的：

览屈氏之《离骚》兮，心哀哀而怫郁（《惜贤》）

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憖于《九章》（《忧苦》）

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一悟（《思古》）

其后还有后汉班固（32—92）在《离骚赞序》中所说的：

《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楚辞王逸注》卷一）

此后到了王逸（？—145？）的《楚辞章句》，不仅《离骚》、《九章》，其他楚辞诸作也终于都被一一具体指明了作者，其中很多篇章都被看成是屈原的自作。于是，屈原作为伟大楚辞作家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强有力的保证，其高名令誉也得以奠定下来。

通览上面列举的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观点，便可以发现一个醒目的变化，即主要情节都是沿着同一路线发展，但部分内容各自有些差异。也就是说，在《史记·屈原传》里尚无“九章”这一作品群的总题，仅止于介绍了其中部分作品《怀沙》、《哀郢》的单篇篇名；可是一到刘向、班固、王逸，就开始出现了这个总题，并且包含了这个总题之下的九篇均被视为屈原的作品，此其一。其二是，《史记·屈原传》里《渔父》尚未

一定被当作屈原之作，而到了王逸，则被明确定为屈原所作。纵观这种推移过程即可推察出，后世的屈原观已迅速地被置于方向既定了的自司马迁至王逸之间，甚至似乎随着年代的流逝，屈原的作品也有渐次增多的倾向；因此，这个时代的屈原像并非当初固定下来之后未变，而似是经过不断地伟大伟大发展成的。以上所论，换言之，也暗示出包括《史记·屈原传》在内的古来传统观点也许出人意料地缺乏可靠性。然而，后世的人们却几乎毫不怀疑地对此维持一种近乎宗教信仰式的绝对性。不过近来的研究，对楚辞部分作品如《远游》、《卜居》、《渔父》等，也论证出了它们均非屈原所作；但是，尽管它对古来的传统观点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正，而相信屈原是楚辞文学的伟大创始人这一基本态度毕竟还是没有改变。并且，历来的楚辞研究竟需如此因循恪守古来的传统观点，诘其究竟，只是根据一条理由，那就是因为对最古的传统观点我们后人纵使有很多不解之处，它到底还是来自“去古未远”的时代。

由此说来，产生古来传统观点的本源的见解——司马迁的屈原观果真可信与否，首先对此重新进行严密的审查是一个首要的研究方法。如果连司马迁的屈原观也意外地早就缺乏可信性这一点清楚了，那么，傲岸的传统观点的权威就会砰然一声崩溃了。到那个时候，屈原真是楚辞的伟大作家，还是只不过戴着纸糊的假面，我们才会从全新的角度出发对其重新加以研究。

二

在对司马迁屈原观的可信性加以考察之前，为了慎重起见，作为考察的前提，必须明确我对屈原的基本态度。如前节

所述，我虽然对赋予屈原以楚辞文学伟大作家的身份终究想持怀疑的态度，但决不是如清末的廖平和民国的胡适那样^④连屈原其人的存在也想加以否定。屈原这位出现于楚国衰亡时期的具有悲剧色彩的忠臣、与后人长期的追怀和景慕相称的热情的爱国者，只要不附加以诗人的属性，恐怕是一位确实存在的人物。何以言之呢？因为前汉最初的诗人贾谊在以“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的歌吟为开头的《吊屈原赋》中清楚地提及屈原之名并追怀哀悼其不幸的命运。另外，与贾谊几乎同时的会稽庄蹻在其《哀时命》中也同样歌咏了屈原之名：“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特别是因为，在可能直接根据楚国某种档案记录之类的可靠历史资料而写成的《史记·楚世家》中，也载有：“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虽然仅此一处，却是有关屈原的明确记载。

然而，司马迁对屈原其人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实可信的呢？考察这一点的最好资料——或者不如说几乎是唯一的资料，当然是《史记·屈原传》。关于这篇《屈原传》的编撰，我们的青木正儿博士曾敏锐地指出：

这篇传记的全文，在时代背景、有关《离骚》的评论、对于昏君怀王的非难诸点上费去了很多笔墨，对屈原本身事迹的叙述却少得可怜而且模糊不清。据此观之，似乎在汉代即已对屈原的事迹不甚了然，《史记》的编者或许是因为同情屈原，因此想尽量把他的传记作得富有光彩。

（《新评楚辞》P18—19）

这一点不知为何被从历来楚辞研究主流中排斥了出来。实际上它极富启发性，恐怕触及了问题的关键。的确，仅就《屈原

传》所记叙的时代背景而言，作为屈原个人事迹的补充说明而叙述的楚国周围的国际形势实在过于冗长，仅此部分就足足占去全篇的四分之一。这篇传记的作法，可以说同其他列传的结构是大相异趣的。并且，这一冗长的部分并非是特意为《屈原传》而作的，而几乎完全是《楚世家》（怀王十六年——顷襄王三年）文章的忠实的转抄。还有，特别是这一部分中关于怀王欲赴武关之会的记叙，《楚世家》（怀王三十年）写道：“昭睢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之国，不可信。’……”这里劝谏楚王的是昭睢，可《屈原传》中却将他改为屈原^⑤。正因为此处前后都是从《楚世家》中借用来的文字，所以只能认为这是司马迁特意想使屈原的事迹焕发光彩的一种编造。如上所述，仅从这篇传记的时代背景部分，即可以列举出司马迁编纂这篇传记时的几点似乎颇为棘手之处。可以看出，这是司马迁为了弥补屈原传记资料的贫乏，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穷余之策。司马迁所采用的屈原传记资料的贫乏，不仅仅从上述之点可以推察出来，如果进一步通览《屈原传》全篇还可以发现，除已指出的占全篇四分之一的是《楚世家》的借用文字以外，相当于这篇传记三分之一的结尾部分的长篇文字，如众所知，也只是全部照搬楚辞的《渔父》和《怀沙》。这两处合在一起已挤去了文章的六成左右。包括这部分在内，全篇的大约四分之三已非来自特别宝贵的屈原传记资料。我们手头如有《楚世家》、《易经》、《渔父》、《怀沙》之类，也大致能完全编写出来，这样说并非过言。不仅如此，剩下的占全篇四分之一的开头部分，确知系从淮南王安（前179—前122）《离骚传》^⑥转抄的段落也占去了相当的篇幅。而且，值得我们怀疑的是，也许从《离骚传》借用的文字比已确知的还要多^⑦。我们这样一清理，便知道司马迁编写《屈原传》所用的

资料出人意外少得可怜，并且也没有大大超过我们手头的东西。

《屈原传》所依据的资料的数量不仅有限，其质量也未必都纯，因而是否全可信赖也令人不无疑问。比如，上述的《屈原传》评论《离骚》部分所引用的淮南王安《离骚传》，也不过是稍微先于司马迁的资料，并且，它是遵从楚辞的热烈爱好者和保护人汉武帝的勅命而作的文章，就这一点看来，也不能不考虑它是尽量逢迎天子之意，有意识地企图树立《离骚》的权威的作品。更为明显的例子是《渔父》，《屈原传》将其几乎完全作为屈原的事迹编入传中，而这篇系后人假托屈原同渔父论辩儒道思想优劣的虚构作品，这已是不容置疑的定论。司马迁连这种靠不住的资料都相信是真实的传记，那么以这种毫无定见的态度编写的《屈原传》，说是饶有趣味的故事还可以，但是毕竟不是信史。或者并非如此，司马迁明知资料不可靠却不得不采用，那也足见其由于缺少有关屈原的传记资料而大伤脑筋。总之《屈原传》——至少其传记中的重要部分，是完全凭借质量上缺乏可靠性的资料而编写的，这样认为并非不妥。而且，从司马迁使用这种暧昧的资料这一点来推论，《屈原传》开头部分对关于屈原被怀王疏远的原因有相当具体的叙述

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或许确实依据了某种资料，然而其真实性如何，却也难以保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致使怀王疏远屈原的原因实在是类于儿戏的琐事”（青木博士《新译楚辞》二十页）；还因为